

1927—
—1937

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

〔美〕小科布尔 著

杨希孟 译

THE KUOMINTANG
REGIME AND THE
SHANGHAI
CAPITALISTS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

(1927—1937)

〔美〕小科布尔 著
杨希孟 武莲珍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年 北京

责任编辑：刘英明
责任校对：易小放
封面设计：王彦萍
版式设计：王丹丹

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

Shanghai Zibenjiayu Guomin Zhengfu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
发行

新华书店 经销
重庆新华印刷厂 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0.375印张 2插页 227千字

1988年8月第1版 198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册

ISBN 7-5004-0081-0/F·26 定价：2.95元

译 者 的 话

本书作者是美国哈佛大学小科布尔(Parks M. Coble Jr)博士。他的这部专著，1980年曾以美国哈佛大学东南亚研究学会的名义，由哈佛大学出版部在美国麻省坎布里奇和英国伦敦出版问世。该书是通过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出版的专著之一；也是他们计划内的有关中国历史问题的一个重要的学术研究项目。

本书的翻译，我们力求忠实于原文。对于书中有的论点，希望广大读者在阅读时，经过科学的历史分析，得出自己的正确判断。

由于译者水平有限，翻译此书难免有缺点或者错误，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1986.12.29

前　　言

在本书的研究和写作过程中，不论在早先当它还是一篇博士论文形式时还是随后修订出版时，都受到劳埃德·伊斯门(Lloyd E. Eastman)先生的指导和鼓励，使我深为感激。我也感谢费正清(John K. Fairbank)先生对我的作品多方面的评论和建议。我同样要感谢贝热尔(Marie-Claire Bergere)、克劳福德(Robert B. Crawford)、曼恩琼斯(Susan Mann Jones)、洛夫(Joseph L. Love)、罗斯基(Thomas G. Rawski)和史克兰(Peter Schran)诸位先生的帮助。如果没有许多图书馆、档案馆的藏书和资料给予的方便，本书的研究是不可能的。我要特别感谢台湾的国民党档案委员会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以及伊利诺斯大学远东图书馆的前主任沃尔夫(Ernst Wolff)先生，感谢这些先生们和各有关单位对我的帮助。我也感谢我的三位亲密朋友，伊利诺斯大学的研究生加贝尔(Allan Grabel)、凯利(Steren Kelley)和赖泽汉(音Tse-han Lui)等位先生。最后，我愿意表示对《中国季刊》的感谢，本书的主要部分，以“国民党政权与上海资本家，1927—1929”的题目发表在该刊第77期(1979年3月)。

现在出版的这个研究成果虽得到国外地区研究基金会(The Foreign Area Fellowship Program)提供的部分研

究员基金，然而本书的结论、观点及一切论证都是我本人的，
不是代表基金会或以上提及的诸位先生们的观点。

目 录

导论	1
第一章 上海资本家的由来及其发展.....	13
一、上海资本家的组织和政治力量.....	19
二、国民党统治前夕的上海资本家.....	27
第二章 国民党到达上海.....	31
一、蒋介石与上海资本家的联盟.....	33
二、蒋介石的辞职下野和上海资本家的喘息.....	47
三、对上海资本家压力的恢复.....	50
第三章 宋子文与上海资本家合作的政策.....	54
一、宋子文对上海资本家的政治动员.....	55
二、上海资本家的政治行动.....	62
三、对上海资本家的镇压.....	64
第四章 宋子文财政政策的概貌.....	74
一、宋子文的赤字财政政策.....	75
二、上海金融资本家与宋子文的赤字财政政策	
.....	78
三、上海银行业的结构与宋子文的合作政策.....	90
四、宋子文与上海工商业资本家的关系.....	93
第五章 宋子文与上海银行界.....	99
一、宁穗分裂与上海公债市场	101

\ 二、 上海公债行情暴跌	104
三、 孙科政府与上海银行资本家	110
四、 宋子文复职和整理公债	119
五、 宋子文与蒋介石在政策上的争执	127
六、 上海银行资本家反对军费开支的斗争	133
七、 宋子文反对赤字开支失败	137
八、 宋子文的抗日经济计划	142
九、 宋子文的辞职	149
十、 宋子文辞职的反响	153
第六章 白银危机与中国经济的萧条	162
一、 白银价格的猛涨与萧条	164
二、 上海金融资本家与萧条	167
三、 上海工业资本家与萧条	173
四、 上海商业界与萧条	187
五、 经济萧条与上海金融界、工商界资本家	188
第七章 孔祥熙与上海金融资本家	191
一、 孔祥熙的赤字开支政策与上海金融资本家	193
二、 1935年3月对银行界的突然袭击	207
三、 1935年6月对银行界的小打击和政府 进一步接管商业银行	225
四、 法币改革与“四大银行”集团的组成	231
五、 1936—1937年上海银行资本家与政府及其 控制力量	238
六、 政府接管中国的银行产业的反响	241
七、 1935年后，作为个体存在的上海银 行资本家	248

第八章 南京政府与上海工商业资本家	252
一、南京政府的经济救济计划与上海工商 业资本家	254
二、宋子文及南京政府对工商业卷入的增加	257
三、宋子文集团——中国建设银行	261
四、宋子文集团——中国银行及其有关活动	271
五、孔祥熙集团	281
六、蒋介石集团——全国资源委员会	284
七、实业部集团	289
八、政府卷入工商业后对上海资本家的影响	300
九、南京政府对工商业的卷入形成了官僚 资本主义	304
第九章 结论	312
节 略	

图表目录

一、政府借款占总收入的百分比表	76
二、军费支出占总支出的百分比表	76
三、贷款偿本付息支付占总支出的百分比表	77
四、南京政府发行的国内债券表 1927—1931	77
五、上海钱业公会购买政府债券项目表 1928年3月—1931年11月	80
六、上海二十八家大银行成长表 1926—1931年	90
七、几种主要政府债券在上海交易所的市价表 1930年12月—1931年8月	100
八、几种主要政府债券在上海交易所的市价表 1931年8月—1932年1月	105
九、几种主要政府债券在上海交易所的市价表 1932年5月—9月	126
十、在上海的中国通货对外汇兑加权指数表 1931—1935年	164
十一、上海银行界的白银储备表 1930—1935年	168
十二、上海几家中国主要银行利润表 1928—1934年	170

十三、中国银行关于中国工业的商业价值的估计表	
1930—1933年	174
十四、中国棉纱价格指数表	
1931—1934年	177
十五、中、日双方棉织厂的棉布年产量表	
1928—1936年	182
十六、上海的华商缫丝和纺丝表	
1928—1935年	185
十七、上海的商业倒闭和改组表	
1933—1935年	189
十八、上海商业倒闭分布表	
1934—1936年	189
十九、国民政府的国内未偿债务表	
1927—1936年	196
二十、上海的国内债券价格指数表	
1931—1934年	198
二十一、上海几家主要银行持有的投资用的证券表	
1931—1934年	210
二十二、银行总资产分布中反映出来的中国的银行 产业结构的改变表	
1934—1935年	239
二十三、中国的生产指数表，1936年	246
二十四、“中国”和“中央”两大银行集团表	
1937年6月	259
二十五、1937年×月以前中国银行的其它重要投 资项目表	274
二十六、抗日战争前全国资源委员会的业务活动表	286

导 论

在本世纪开头的二十五年间，现代资本主义在中国扎下了根。特别是1895年后，在与西方交往的刺激下，现代化的商业企业、西方型的金融机构和中国人自主的工业都出现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紧接着的一段时间，由于西方的竞争暂时缓和而创造了特别有利的发展条件，因而这些工商业的成长尤其强大。虽然这些经济的现代化部分的规模仍然比较弱小，但是由它而产生出来的中国现代商业资产阶级却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中成为一个有生气的新成份。

那些在现代中国的商业、工业和银行业等方面发展成为中心人物的资本家，上海的资本家是最强大的，以具有坚毅领导能力的上层人物为首，他们在本世纪早期混乱的几十年间，在政治上变得很活跃。各种组织，如上海总商会、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和上海各路商界总联合会等等，都是为上海资本家服务的机构。当1927年国民党取得对上海的统治时，上海资本家已经是在华中具有十多年历史的一个重要的政治、经济的集团了。

蒋介石与他的同盟者于1927年春在南京建立了国民政府。有十年之久，它是中国主要的政治力量，直到1937年夏因日本的入侵才受到削弱。从三十年代起直到现在，许多作者

对国民政府在南京的这一段时期，仍然有一个共同的论断，认为当时国民党政权与新出现的城市资本家阶级结成了紧密的联盟。例如，日本学者长野明(Akira Nagano)1931年写道：“近来，上海及其它大城市的资本家的影响显著地增强了。不取得这个具有强大影响力量的支持，中央政府就不能存在……，这些资本家……支配了政府的政策”。^①鲁斯的《幸福》杂志1933年论证说，南京政权主要地建立在上海银行家的联盟基础上。^②左派编辑斯潘塞(F. Spencer)1934年评论说：“改组后的国民党系建立在上海银行家、城市工商业资产阶级及农村地主阶级等新的社会基础上”。^③鲍华伦(R. Barnett)1941年为太平洋关系学会著文时论证说，1927年后，“一个进取的但又是反革命的中国资产阶级给予执政的国民党以主要的鼓励和支持”。^④

还有更多的现代的作家附合了这个论点。象小摩尔(B. Moore, Jr)虽然也强调了农村地主阶级，但他将国民党的社会阶级基础看作是“旧的统治阶级中的一部分与城市新兴成份间的融合体”。^⑤外交家穰杰德(C. Ronning)在他的1974年回忆录中，将南京政权描述为蒋介石的军事将领们、陈氏兄弟们和“强有力的上海金融和商业巨子”的结合体。^⑥从三

① 长野明(Akira Nagano):《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东京, 1931), 第19页。

② 《幸福》第7期(1933年6月), 第115页。

③ 斯潘塞(Frederick Speeier):《蒋介石的独裁错误》，载《今日中国》第1期(1934年12月)，第46页。

④ 鲍华伦(Robert W. Barnett):《上海经济——政治的抵押品，1937—1941》(纽约, 1941), 第12页。

⑤ 小穆尔(Barrington Moore, Jr):《独裁与民主的社会根源：近代世界形成中的贵族与农民》(波士顿, 1966), 第192页。

⑥ 穰杰德(Chester Ronning):《革命中的中国回忆录》(纽约, 1947), 第41, 42页。

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学者、新闻记者、外交家和政治评论家对国民党政权，都经常持有这样一个共同的论断：南京政府与新兴的城市资本家结成了紧密的联盟。这个资产阶级与农村地主阶级形成了蒋介石政权的社会阶级基础。这种联盟的论点显然含有这样的意思，即南京政权主要代表了资本家的利益，而资本家们能够对政府起到相当的政治影响。

这个论断是站不住脚的。这是因为事实上，存在于两个集团之间关系的真正特点是：政府竭力从政治上压制城市资产阶级，并榨取这些经济现代化部分的力量。以岁入而论，支配南京政府政策的既不是资本家们的利益，也不是政府对发展经济的可能性的关切。恰恰相反，政府的行动加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弱点，而趋向为列强的经济利益服务。从政治上来讲，南京政府完全不理会这些资本家通过上海总商会和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这些组织所表达出来的意见，事实上反而要极力把这些商业团体置于政府控制之下。作为一种政治力量，资本家处境是艰难的，而且到了1937年更沦为政府的附属品了。南京政府并没有代表资本家的利益，资本家也不能对政府的决策有什么重大的政治影响。

尽管如此，国民政府却从来不曾试图有计划地去消灭资本家或资本主义制度。直到南京政府统治的后期，对私有企业也不曾有过规模广泛的国有化，就是后来也没有社会主义制度的强烈倾向。国民政府与资本家两者都对共产主义抱有强烈的反感。南京政府与资本家之间关系的紧张，并非根源于意识形态，更多的是国民党政权的特性和它对资本家的苛求所造成。

南京政府是北伐战争的一个终结。这个军事战役于1926年7月开始，北伐军从国民党根据地广州出发。但当时国民党

革命运动的政治方向并不明确。孙中山留给这个党一份混杂、麻烦的遗产；根据有点过于含糊的《三民主义》的原则，这个党把保守分子与共产党分子、商人、工人、军人与学者这样一些完全不同的成份包括在一起。当北伐军刚从广州出发时，中国即将出现三种革命：政治革命、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和社会革命。

政治革命——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府——是最简单的。国民党发出了在军事上打倒军阀和建造一个新的全国性政权的号召。这个政权要能坚定地管理各个地方政府及国内所有的军事力量。只有如此，政治革命的胜利才有可能结束军阀统治时期的混乱。

这个党的第二个激励的号召是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外国人控制了中国将近一半的现代工业、国际贸易、现代银行业；外国侨民置身于中国法律之外；外国政府压在北京政府身上好多债务，并且支配了中国的海关、盐务管理和邮政。然而，尤其令人气愤的是那种在通商口岸地区盛行的种族歧视——许多公园、俱乐部、餐馆和学校都禁止中国人进入。随着1925年“五卅运动”的觉伐，对这种状况的不满而产生的反帝情绪席卷了全中国。北醒战争乘着这股反帝的热潮，发生了对外国人和外国特权的攻击，包括收回了武汉英租界和1927年3月的“南京事件”。

北伐战争的第三方面是社会革命——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激烈对抗。中国的农民和工业无产阶级是这个运动的两个潜在力量。当它还在广州时，国民党就在这些团体中发动了群众运动，以期激发他们的革命潜在力量。党领导下的工会显得很有威力。国民党农民部所组织的农民协会声称

它代表了八十万会员。^①北伐还没有开始，群众运动的烈火就已经燃烧。强大的劳工力量实际上控制了武汉和上海。农民协会迅猛发展，在湖南尤为显著。

这个群众运动的最初目的，是要为北伐战争培植支持的力量，而并不在于激起阶级革命。然而由于这个运动的大多数领袖来自国民党左翼，包括了一些中国共产党党员（例如，毛泽东当时是国民党农民部的书记），这样一来，在北伐的热潮中，群众运动更加高涨，而社会革命的幽灵也就出现了。这种潜力吓坏了国民党内许多人，并且正当北伐战争在华中取得胜利时，党内发生了分裂。那些反对社会革命，而且害怕共产党会控制国民党人们，结合在蒋介石的周围，在南京建立了政权。激进分子则在武汉组织政权。蒋介石得势后开始镇压群众运动。从此以后国民党政权一直都在坚决地反对社会革命。

1927年的这些事变，极大地形成了国民政府和十年南京时期的特征。开初，蒋介石的胜利还并不完全，社会革命的幽灵仍然存在。共产党人撤退到农村边界区，在那里继续坚持农民革命。蒋介石一心妄想要把这一威胁消灭掉，内战便成为南京时期的一个经常特征。1927年的分裂也逐渐损伤了国民党的有生力量。清党，把许多最有献身精神、最富有革命理想的革命家清除出去，而使党和政府成了一个为谋取私利的官僚分子所把持的机构。^②总之，作为革命变革工具的国民党被大大地削弱了。

① 乔丹(Donald A. Jordan):《北伐：1926—1928年的中国的国民革命》(夏威夷 1976)，第180页。

② 伊斯门(Ilogg E. Eastman):《流产的革命：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1927—1937年》(麻省 坎布里奇 1974)，第7页。

南京政府反对社会革命和群众运动，使它与农民阶级割断了联系。国民党很少去组织农民群众，也不去实施任何改善他们命运的计划。在南京弥漫着的一片反共气氛中，甚至提倡农村改革的主张也受到猜忌。因此，新政府从来没有牢固地掌握中国的农村社会；它所能控制的区域绝大部分限于城市地区。南京政府缺乏创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所必须的基本因素——全民的政治动员——因此，它的力量是有限的。例如，从财政而论，南京政府的收入几乎全部是从城市现代化经济部分收集来的，而不能从传统的农村经济部分获得很多重要收入。由于经济上现代化部分比较薄弱，以1933年为例，现代经济成份的收入估计只占国家总收入的12.6%。农村地区理应是南京政府的一个更强的财政基地，^①然而要开辟这样的财源，需要对农村地区有坚强的控制，而这却又是南京政府所缺乏的。

1927年的事变削弱了国民党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尝试。虽然在北伐进程中反对帝国主义的暴力持续升级，但是国民党收复中国主权斗争的策略仍然是对抗与商谈两手相结合。好几个国家的军队被派遣来到上海，随着南京事件的爆发，外国对中国的干涉似乎可能发生。宁汉分裂后，蒋介石面临着一个对立政权的严重挑战，他决定不能冒两面作战的风险，所以蒋选择了一条与列强合作的政策。南京政府并未放弃寻求取消帝国主义特权的努力，但是它宁愿通过商谈途径来解决。这样做是有过一些胜利的，例如，政府获得收回关税自主权。然而列强在中国的基础结构仍原封不动。国民

^① 费维德 (Albert Fenerwerker)：《中国的经济，1912—1944年》(安亚伯 1968)，第8、47页。